

孙频:跳出女性写作,拥抱更深广的大河



孙频 本人供图

两年前记者采访孙频时,她曾表示自己写得太快太锋利了,希望有所改变,这种“转型”在她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《鲛在水中中央》中有着明显体现。

很多人用“残酷”“冰冷”“血淋淋”来形容孙频的作品。的确,面对现实,孙频的写作就像一把刀,直接插入致命部位,不给读者留一丁点喘息的机会。这种深入骨髓的凉意在新作中有增无减——《鲛在水中中央》写了矿场中四人合谋杀人,《天体之诗》写了工厂倒闭后厂长跳入电解池自杀,《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》中男主人公为了冒领母亲的退休金,将母亲的尸骨埋在院中树下。

但三篇小说的人物拥有共同的内在气质,他们都是身在泥沼却渴望光明的,温柔的暖意在那残酷的故事里若隐若现。《鲛在水中中央》的杀人凶手尽管狼狽、悔恨,却坚持刮胡子、穿西装,在非正常的生活里,坚持着仅剩的尊严;《天体之诗》中的下岗女工李小雁,无家可归,精神错乱,却坚持写诗,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幻想;《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》的小男孩拿着存钱罐里的钢镚,打算去澳大利亚寻找父亲,尽管他的父亲在狱中,澳大利亚只是母亲编织的一个白色谎言。

“我为什么要带着暖意去写人,这与我的年龄增长有关系,二十多岁的时候,看到冷酷的东西就全部写出来。我现在三十多岁了,看到十分,只写两分。”孙频将最残酷的部分遮盖住,换一种方式来表达,“不能再把人性的残酷摆出来给人看,意义不大。”

作为80后一代写作者中的佼佼者,孙频身上贴有不少的标签。因为她特别擅长描写女性,写出了现代女性精神中难以言说的部分,她的写作被归为女性写作的范畴。这次,她有意撕掉女性写作标签,向更广更深处走去。她第一次使用第一人称写作,三个故事中的“我”——隐居的杀人凶手,四处流浪纪录片的导演,冒领母亲养老金的巨婴,他们都是男性。孙频说:“作家写着写着,会很讨厌身上的标签,我不愿再被局限或困在女性意识里。我想做些尝试,不是‘女性’的写作,而是‘人’的写作。”

孙频也是近年来备受市场关注的学院派作家。小说集中的《鲛在水中中央》和《天体之诗》分别发表在今年第一期的《收获》和《北京文学》,短短几个月即被结集出版,可见其作品的大众认可程度和市场号召力。

现代快报+/ZANER南京记者 陈曦

不愿再被困在女性意识里写作

读品:《鲛在水中中央》收入的三个中篇小说与你之前的作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不再以一贯的女性视角创作,而是尝试通过男性的第一视角讲述故事。这种视角的改变出于怎样的考虑?

孙频:以一个样貌写久了,人就会产生一些厌倦感嘛,想换个视角换种可能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年龄渐长之后,人会变宽容变平和,人只有在变宽容之后,才会注意到一些原来不曾注意到的人群和事物,会突然发现一个细节里的生机盎然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女性这种性别认识的演变,从一开始的无知蒙昧到突然而来的认识,如同暴饮暴食,再到后来的不认识,再到后来失去了认识的兴趣。这个演变过程自然不是凭空而来,可以放到1990年代及2000年之后的社会背景之中,自然可以看出,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演变,其中也自有它变化的内在逻辑。我后来就觉得,不做与那个真实的自己错位的事情最重要。

读品:总体来说,你以往的小说中对女性的看法比较保守,现代元素较少。是故意体现男权社会的偏见吗?比如早前的《祛魅》和《无相》两篇中对女性的描述。

孙频:其实不是我故意要体现来自男权社会的偏见,而是我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就是这样的,表象不等于真正的现代文明,也许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吧。你所说的现代元素,我只在小说里看到过。二十来岁的时候,我读小说,以为这就是生活。三十岁的时候,我知道那只是小说。二十来岁的时候,我以为性别之间确实有平等,三十多岁的时候,我明白那只是一种期盼。

陈旧的创口构成了记忆中的家乡

读品:《鲛在水中中央》的小说背景与你去年的《松林夜宴图》有一定的相似性,时间跨度较大,涉及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,这些都是50后、60后作家比较熟悉的书写领域,你是80后作家,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熟悉那个年代并且把它比较真实地再现出来呢?

孙频:因为出生在1980年代,经历上就无法与前辈作家相比,童年时候的很多模糊的记忆片段在长大之后变成了一种拼图,拼出了一些自己不曾经历过的历史和过往,与当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追根溯源,想挖出自己埋在泥土里的根。又像一个人站在山洞口朝里张望着,什么都看不到,却因为这看不到而倍感神秘和向往,从而多了些探索之心。小说本是一件在众生之上探险身心的事情吧。还有个想法就是对自己的挑战,想看看自己能否跳出那点女人的小心思、小哀怨、小困惑,想让自己跳进一条更宽阔壮丽的大河里游荡,从而淹没那点自恋与自怜,让自己看到一个个体在历史与时间中的微茫和渺小,心中多少会宽阔豁达一些。至于怎么把一个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真实表现出来呢,需要采访很多人,需要和那些年龄大的人聊天,还



《鲛在水中中央》
孙频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需要从那些模糊的记忆中生发出无限的文学想象力。

读品:有人说,你的小说和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有相通之处,可能因为你和他的家乡都是山西小县城,作品元素多取材于当地的厂矿、废墟,作品中的那些小人物都是废墟之中的坚守者。这样的背景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吗?

孙频:因为我们的家乡就是邻县嘛,风土人情地貌气候都差不多,小县城的面貌和气质也差不多,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我近来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地域对人的影响,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气候会养育出什么气质的人。可能是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,不管承认不承认,人从来都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。小县城因为小,就容易了解和把握它的脉搏和精气神,也因为小,它任何的变迁和创伤都会赫然袒露,无处遮掩。也是因为小,它自身的消化能力便有限,所以那些历史中留下的痕迹和创口便依然可见,但就是这些陈旧的创口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家乡,以至于我离开家乡多年,记忆仍然停留在那种气息里。这种气息里,有我的父母,有我的邻居,有我的小学同学。所有的人都会在时光里慢慢变化、衰老、消失,但那些童年时候的记忆在成年之后却会不停发酵,变得越来越坚固。

读品:《鲛在水中中央》和《天体之诗》都涉及到1990年代下岗潮引发的罪案,这也是同批80后作家比较青睐的写作素材,比如双雪涛和班宇都写过,为什么关注点会放在这上面?

孙频:我倒觉得不是同批的80后作家都在关注这个素材,而关注这个素材的几个人,有可能是因为有着较为相似的童年经历,最起码在同一个年代目睹过一些相同的社会事件,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写作,还是属于个体经验的释放和修复。有时候,我觉得一个作家真正的最有感情的经验还是十八岁之前的,那种最本真最饱满的经验,是每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。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,正好目睹了中国一个县城里的一场改革和剧变,这场改革牵扯到了很多人的命运,我的父辈,我的邻居,包括成年之后的我,也与他们之间有着属于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。对于我来说,这是一种消化多年前创伤的最好方式,有真正的疼痛和感情在里面,我认为疼痛和感情是写作中最重要的。

作家的核心气质是原生的

读品:你说你以前写得太锋利了,写作速度太快了,想要有所改

变,现在你觉得自己的“转型”达到你的预期了吗?

孙频:一个人倘若还对自己有点要求,就不可能轻易获得达到预期的感觉。我十年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写得很快,也写得很用力,几乎要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进去,那是一种喷涌的状态,是啊,那时候老被人说写得太多,但是后来渐渐就慢下来了,快不起来了。其实,几乎每个作家都会有那么一个喷涌期,都会在那么几年时间里几乎要把自己所有的经验和情感燃烧殆尽。但这只是一个阶段,不会永远这么下去,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内部运转的规律,一个作家的成长也是如此,总会在写作的路上不断反省,不断调整,不断学习,且与一个人的处境、心境、年龄等都有关系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没有谁会一直停留在原地,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变化和调整,有自己新的节奏和状态。

读品:你的小说辨识度很高,底层叙事,将人物的生活或命运推向极端,然后形成了一种类似哥特美学的风格,这可能也是你想改变的一个原因。你怎么看一个作家写作同质化与风格化的问题?

孙频:其实所谓风格化就是用相近的笔调写了一批相近的题材,这种相近某种程度上也能算是同质化。可以说没有一定的同质化也就没有风格化。但是风格化形成之后并不就是铁板一块,它只是作者一种最本能的叙事腔调和取材偏好。随着阅历和读书以及其他种种影响,一个作者的叙事风格以及题材都是会慢慢发生一些变化的,但又不是那种面目全非的变化,还是能在变化中看出属于这个作者的核心气质,这种气质是原生的,可能会一直伴随着这个作者吧。

读品:你在山西出生,在甘肃读大学,在北京读了创意写作班,后来又调到江苏做专业作家。你觉得这几个不同地域的变动,对写作和视野带来什么新的东西?

孙频:最初到一个地方会觉得有些痛苦,地域气候上的不适应,当地文化的排外,陌生人群的距离感,等等,都会对写作者产生一定的冲击性。但是只要时间一长便感觉到了其中的好处,这好处其实就是由文化冲突带来的活力以及新的视角。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和离开之后回望这个地方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,有了审视,也有了新的发现和感触。与故土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,而多种文化的碰撞会让一个人变得宽容,那么更多的东西就有可能进来。

读品:新书里有两篇小说都是今年才发表的,《鲛在水中中央》发在《收获》第一期,《天体之诗》发在《北京文学》第一期,发表几个月很快就结集出版了。感觉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被市场和出版商牢牢盯紧的“纯文学作家”。你是怎么看待作品中的文学性和大众性的?

孙频: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未考虑过是写给谁的,从未考虑过我的作者群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我写的是我最想表达的东西,写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作者和自己的一种对话吧。为了迎合自然会减损文学性。但如果作品碰巧能被一部分读者喜欢,那也是因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隐秘的联结,产生了共情,还有一种可贵的懂得。这对于作者来说,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因为,所有的作家都是需要读者的,这也是一种对话。